

试论历史的“重演”与历史学的“预言”

张 耕 华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一),历史中有没有“重演”,有没有重复性。涉及什么叫“重演”;自然界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肯定它有“重演”;历史中有没有“重演”,历史在何种意义上也可以肯定它有“重演”;历史中的“重演”是不是如通常所说的,只是一种非严格性的或不完全性的“重演”等问题。(二),历史学中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命题。涉及自然科学中的普遍性命题在“预言”上有没有差异;历史学中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预言”功能的普遍性命题;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中的普遍性命题具有什么特点;如何理解历史学中的普遍性命题在“预言”上的例外;“预言”的例外,是否意味着该命题不具有普遍性等。所有的这些讨论,都局限于事实认识的层次上,价值认识层次上的这类问题,需要另外作专门的讨论。至于本文的论述能否成立,也无十分把握。撰成此文,作为一孔之见,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

历史会不会重演,这是历史规律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但也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历史确是不会重演,那么有关历史学能不能概括出普遍性的结论,历史学中的普遍性结论能不能作出有效的预言等问题,也就不必讨论了。因为,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所以,凡是对后者持否定意见的学者,总是先要否定前者。在西方学术界,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就有许多学者研究过这个问题。最初有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后来又有沃尔什、波普尔等。他们的观点是:历史中只有个别、特别的东西,没有普遍、一般的东西,历史不会重演。如文德尔班曾说:“历史是有个人特征的人物的王国,是本身有价值而又不可能重演的个别事件的王国”。“人类的一切兴趣和判断,一切评价,全都与个别的、一次性的东西相联系”。波普尔也曾说:历史学的任务是“研究特殊事件及其因果说明”,“在历史学里我们掌握的事实往往非常有限,而且不能照我们的意志去重演或补充”。

我国学者李桂海先生在《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一文(以下简称李文),也讨论了历史的重演问题。李文写道:“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经得起历史的经验,这是它的个性和特长;但却无法用现实或未来对之进行检验,这是它的缺陷。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历史学家可以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向,但是任何历史都不可能重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页。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载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3页。
波普尔:《历史有意义吗?》,载于《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152页。

演。历史在发展进程中,可以有某些反复,可以有惊人的类似,但却不可能重演,哪怕是某些具体的历史细节,都不可能重演,因为即使它非常相像,但却已经不是同一的历史,它的历史时代和背景已经不同,其历史的内涵也就不一样了。

严格的科学,其得出的结论和发现的规律,都是可以重演的。有的在严格的实验室条件下可以重演,有的也可以在大自然的环境和条件下重演。重演,这是检验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手段。可是历史的舞台是大社会,再高明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重演某个历史问题,来检验其科学性。

任何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结论,都是可以用实践来检验的,而且必须用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唯一手段,来验证自己的研究是否科学。可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说,是无法用实践来检验其是否科学。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在现实社会中早已不存在,以后也永远不会再产生,所以对任何历史问题,都无法用实践来检验其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历史学界为什么长期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难以做出定论的主要原因。因为无法用实践检验出哪种观点正确,哪种观点错误。既然没有检验真理的标准,当然就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李文的这些论述,有不少地方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比如,按一般的理解,历史规律是一种一般性或普遍性的历史认识,它是对历史中的那些带有普遍性的矛盾斗争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由于这些矛盾斗争是贯穿古今的,所以这类认识不仅可以被以往的历史事实所检验,也可以用现实和未来的社会实践来验证。如果我们肯定历史学家能够研究和概括出历史规律,那么我们就肯定了历史中存在着某些重演性,也就肯定了这些认识可以在现实或未来的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如果我们肯定历史不会重演,历史认识也不可能在现实或未来的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那么我们就肯定历史学家不能概括出任何历史规律,因为历史本身没有规律。李文一方面肯定历史学家可以研究历史规律,并对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向作出预测;另一方面又否认历史有重演,否认现实或未来的社会实践对历史认识的检验,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又如,按一般的理解,自然界中既有个别的、特殊的东西,又有一般的、普通的东西,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既有个别的、特殊的认识,又有一般的、普遍的认识。对这些不同性质的认识的检验,我们应该相应地在不同的范围和层面上展开,否则达不到检验的目的。历史学中是不是只有个别、特殊的认识,而没有一般、普遍的认识,这里姑且不论。即使如此,那么对它的检验也只要在相应的范围和层面上进行就是达到检验的目的了,不必要求它能在其他范围或层面上通过检验。什么范围和层面上的认识成果,应在相应的范围和层面上进行检验,这是一切科学研究活动都应遵循的检验原则,历史学也不例外。事实上,历史学家在对认识成果进行检验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这一原则。如果我们因

李桂海:《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学习与探索》1994.3。

有关通过现实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历史学中的一般性认识,可以参阅:姜义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研究》,(载于《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曹伯言:《“史学概论”三题》(《学术月刊》1987.6);吴泽:《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04页);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268页);赵吉惠:《史学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8页)。

参阅曹伯言:《“史学概论”三题》,《学术月刊》1987.6。

为“拿破仑死于何年何月”或“哈斯丁斯战役发生于何年何月”之类的认识有分歧时,我们总是希望在文献的考订和考古发现等史学实践中来解决分歧,谁也不会荒唐地指望通过现实和未来的重演来检验这些认识。

如果上述讨论可以成立,那么李文的论述就不好理解了。按李文的说法,历史都是特定的东西,它在现实社会中早已不存在,在未来也永远不会再存在。那么,对这种特定东西的认识的检验,只要经过历史的验证就够了,不应该也不可能现实或未来的社会实践中寻求检验。如果这些认识众说纷纭、争论不休,那么也不是因为它们不能在现实的实践获得检验所造成的,更不可能通过现实或未来的实践来解决。李文说,历史学是一门对特定东西进行研究的科学,它的结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表现为学科的个性、特长和科学性。又说,对特定东西的认识因无法在现实或未来进行检验,结果造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体现出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局限性。我们知道,能为历史检验,不能为现实或未来检验的,只有是历史学中个别的或特殊的认识。然而,为什么同是这一类认识,一会儿说它是历史学的个性、特长,体现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一会儿又说它不能为现实所检验,造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体现出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局限性呢?显然,李文的论述在逻辑上还是有矛盾的。

虽然我们对李文提出了许多疑问,但是这些都是支节问题,关键是历史究竟会不会重演,这也是本文将要着重讨论的问题。有关历史的重演问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历史中存在着重演,但历史的重演与自然界中的重演不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或完全的重演。持这种观点的,大都是国内的学者。比如,万斌先生在《历史哲学论纲》一书中写道:“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存在着重复性,……但是,历史规律的重复性又有别于自然规律的重复性。在严格意义上,历史规律中不存在完全的重复。……每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在其运行中,都具有不同的主体,打上了不同的主体烙印和风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感,不可能完全一致和再现。历史规律所内蕴的现象和过程的重复性,只是对那些具有相似性但却具有同类普遍规定的现象和过程的归纳和概括”。王和、周舵先生的《试论历史规律》一文,也持这样的看法,该文写道:“‘历史规律’有着有别于哲学的‘规律’的特殊性。因为,如果说一般而言的‘可重复性’是指‘能够再现’的话,那么,在‘历史规律’中则完全不存在这种严格意义上的‘重复’,因为历史是不可能再现的。所以,‘历史规律’对所谓‘可重复性’的研究,仅仅是指对那些具有相似性的同类历史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总之,认为自然界有严格的、完全的重演,历史中则没有严格的或完全的重演,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但也是一种值得推敲的看法。

二

事物的重演问题,既是本体论上的问题,又是认识论上的问题。说其是本体论上的问题,那是因为没有重演,总是有关事物本身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外加上去的東西;说其是

万斌:《历史哲学论纲》,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169页。

王和、周舵:《试论历史规律》,《历史研究》,1987.5。该文是新时期以来有关历史规律问题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

认识论上的问题,那是因为将事物本身所有的某种东西称之为重演,总离不开我们的描述和概括。这就好像原因与结果这一对概念。事物本身无所谓原因与结果,是我们“把宇宙的现在状态看作是它先前状态的效果,随后状态的原因”。是我们用原因与结果这一对概念来描述这种先行与后继状态的关系。(当然,这样的理解并不是说原因与结果完全是我们主观加上去的)

庞卓恒先生曾说,历史共性的概括,就好比数学里的“求出一个‘最小公倍数’”,或者可以比作是提取公约数,给出2、4、6、8、10等一组数字,能不能提取出公约数,既取决于这一组数字本身的性质,也取决于我们所使用的方法。所谓取决于使用的方法,并不是说我们的方法可以决定或改变这一组数字的性质,而是说正确地使用了某种方法,可以使这组数字的某种性质呈现出来。因此,当有人说2、4、6、8、10这一组数字不能提取公约数时,我们便要考察一下,究竟是这组数字本身不具有某种性质呢,还是我们的认识方法有误。历史中有没有重演问题,也需要作这样的反省。

认为历史不会重演的学者,大都肯定自然界中有重演,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讨论一下衡量重演与否的标准问题。究竟怎样才能称之为重演呢?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对此,学者们并无专门的讨论。从上文所引的李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李文对重演的理解:(一)重演就是重演,它不是反复,也不是惊人的类似;(二)重演可以在具体的细节上进行;而且具体细节上的重演是很容易达到的。以此来衡量历史,那么,历史显然是不能重演。如果我们坚持重演就是重演,不是类似,那么这里的重演一定不是具体细节上的重演;如果我们坚持重演可以在具体细节上进行,那么这里的重演一定只是类似。要在具体细节上进行不是类似的重演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样的重演在自然界中能否达到呢?如果我们对重演的理解有误,用来衡量历史有没有重演的尺度有误,那么,有关历史有没有重演的问题不仅不能弄清楚,与之相关的讨论也就更加混乱了。

重演,又称重复、再现,是规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日常生活里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数次观察了“太阳从东方升起”或“苹果落地”的情景后,我们就会说它是一种重演。但是,这里的重演究竟是指事物的具体细节上的类似,还是指事物的某种本质、关系或属性上的同类,人们往往并不去仔细分辨它。有时,我们也用“重演”来表示对象的“自身绵延的同一性”。重演一词被用来描述几种不同的状况,在日常生活里并不会引起误解或争论。但在科学研究中,区分它的不同含义,确切地使用这一概念就相当重要了。

比如,假设有这样四个事例(为了便于讨论,下文简称事例a、b、c、d)

a,1916年1月1日,爱因斯坦在他的试验室里,运用实验工具和设备,使容器中的水由液态转变为固态。

b,1995年1月1日,由于气温的下降,上海市区某一街道的路面积水,由液态转变为

著名科学家拉普拉斯的名言。引自郑玉玲:《必然性与偶然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庞卓恒、高仲君:《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几个问题的商榷》,《中国史研究》1981.3。原文为:“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这古代东方四大文明古国同俄国的历史背景就有极大的不同。而这四大文明古国彼此之间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尽管如此,毕竟能够在它们之间求出一个‘最小公倍数’,也就是导致东方国家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些共同的条件”。本文比作提取公约数。公约数即几个数的共同约数,约数越小,共有的范围越大;约数越大,共有的范围越小。公约数的提取似乎更类似于历史共性的提取和概括。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5页。

固态。

c,1996年1月1日,我在家中,利用电冰箱,使碗中的水由液态转变为固态。

d,1996年1月2日,我在家中,利用电冰箱,使碗中的水由液态转变为固态。

这四个事例是否体现出一种重演呢?这当然取决于事物本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我们的认识目的以及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相应的认识方法。

我们知道,人的认识总是由个别开始的,由个别走向一般,因此,个别和一般也可以看作是认识的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我们所抱的认识目的和认识方法是不同的。在前一个阶段里,认识的目的是确定和区分一个个个别的、特殊的事实和事物,思维的操作在于弄清它的具体内容,如它的时间和空间的定位,它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不如此关注它的具体内容,不对它的时空位置加以严格的定位,我们就不能把一个个个别特殊的东西确定下来,也不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在这一阶段里,认识的目的决定了我们不会把这四个事例看作重演,思维的操作方法也不能使这些事例呈现出重演性。有时,事实或事物的具体内容非常相似,如上文列举的事例c和事例d。这种相似,虽然常常被称为重演,但是它们只是相似。因为,特殊的事实或事物,都有自己特定的时空定位,有自己独特的内容细节。当我在1月2日想“重演”1月1日的那个特殊事实时,所“重演”的已不是1月1日的那个特殊,而是产出了一个新的特殊。特殊之所以称其为特殊,就在于它是不能重演,否则我们也就不称其为特殊。关于这一点,哲学家金岳霖曾有专门的讨论,他说:“事实可没有普遍的。所谓普遍就是超特殊的时空。事实不但不超特殊的时空,而以特殊的时空为一必要成分。任何事实总是在某时或某地的事实”。“事实既只是特殊的,它当然是不能重复的”。

当我们的认识由个别进入到一般时,认识的目的是寻求事物的一般或普遍,思维的操作是抓住事物的共同点,撇开它们的差异。不作如此的操作,那么我们的认识便只能停留在个别、特殊的事物上,也无法将感性的材料整理规范。在这一阶段里,事物的具体内容,它的大小、轻重、长短都不相干了,特殊的事物一旦摆脱了时空的定位后,它便成了某种关系、本质或属性的象征了。这时,事物的关系、本质或属性就呈现出一种同类性,因同类而表现为重演,不仅事例c和事例d是重演,整个这四个事例都呈现出重演。

如果上述的分析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区分重演一词的两种不同的含义和用法。(一)重演一词可以用来指称事实或事物的具体内容上的相似;(二)重演一词也可以被用来指称事实或事物的某种本质、关系或属性上的同类。在前一种情况里,重演相当于类似或相似;在后一种情况里,重演的含义是同类。它们分别运用于不同的两个认识阶段里。虽然我们有时说某某事实重演一次,但这里所说的重演,“不是一件特殊的事实重演,而是两件特殊的事实同类。两件或无量数件的事实可以同类而一件特殊的事实决不能重复”。混淆了重演一词的不同含义和不同用法,就会想象出一种具体细节上的重演,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历史,结果历史就显示不出它的重演性。上文所说的历史不会重演的观点,恐怕与这种同类与相似的混淆有关。

如果上述的分析可以成立,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重演一词在用来表示事物的

具体内容和细节的类似时,可以有严格与不严格、完全与不完全、近似与非近似的程度差异,而在用来表示事物的某种本质、关系或属性的同类时,就不存在什么严格与不严格、完全与不完全、近似与非近似的程度差异。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从牛顿观察的苹果落地,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大小球同时落地的实验,到月亮绕地球运行或地球绕太阳运行等,就其所呈现的事物的“理”(F = G $\frac{m_1 m_2}{r^2}$)而言,都是真正的重演,并无严格不严格、完全不完全的差别。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些事情的具体内容细节,那么就只有相似了,有些连相似也说不上。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中的所谓严格的、完全的重演,也是撇开了事物的具体内容细节,而专指事物的某种“理”的重复呈现。那么,撇开历史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历史中的“理”会不会重演呢?这种重演是不是严格的或完全的呢?下面,我们以规律问题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恩格斯关于“不同阶级的联合与分裂”的规律概括为例作一点分析。

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曾概括过这么一条规律:“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历史学家黎澍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一文在引录了恩格斯这段论述之后写道:“这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的说明。……中国人对这种共同敌人消灭以后,内部发生分裂的现象是熟悉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事件出现过许多。太平军打下南京,接着就发生了内讧。辛亥革命义旗刚刚举起,同盟会内部就分裂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因北伐军打下南方数省而分裂。第二次国共合作因日本投降而分裂”。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恩格斯概括的这一条历史规律就重演了四次。而且每一次重演,就其对历史之“理”的表征而言,并不存在严格与不严格、完全与不完全的差别。与上文列举的自然科学中的几个事例对 F = G $\frac{m_1 m_2}{r^2}$ 的数次重演的表征而言,也不见得有什么严格与不严格、完全与不完全的差别。

三

历史中有没有重演问题的另一角度的探讨,是考察历史学中的普遍性命题以及它的预言功能。这可以沃尔什、波普尔的研究为代表。

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的“历史学与科学”一章里,以知识的普遍性为考察对象,比较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三方面异同:(一),历史学家主要关心的是个别事件,而不是普遍的结论,自然科学则相反;(二),自然科学里有真正的普遍性命题,而历史学则没有;(三),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命题可以作出成功的预言,而历史学没有预言能力。波普尔也持这样的看法,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也谈到“对于特殊事件及其说明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0页。

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按本文的理解,事实都是个别的、特殊的,只有同类的事实,没有普遍的事实。因此,黎文中的“非常普遍的事实”的说法不甚妥当。这里所说的“非常普遍的事实”和“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事件”,都是指事实或事件的同类。由此可见,同类与相似的混用,是史学理论研究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5页。

这种兴趣的科学,可以称为历史的科学,以别于概括性和科学”,谈到“这种对于历史的看法,说明了为什么许多研究历史和历史方法的学者坚持说他们的兴趣是在特殊事件上,而非任何所谓普遍的历史规律。因为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不可能有什么历史规律”。人们也无法预测历史未来的发展。

的确,历史学家或者说大多数历史学家主要关心的是个别、特殊的事件,而不是普遍性的结论,这是事实。而且,这也确实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主要关心个别事件而不是普遍性的结论,与历史学能不能产生真正的普遍性结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历史学家不关心普遍性结论就说历史学不能产生普遍性的结论。所以,关键还在于后二方面的差异,即历史学究竟有没有普遍性的结论。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主要、也是最令人信服的一点,就是她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现实或未来不断地加以证实。这样的研究成果,沃尔什称之为真正的普遍性命题或开放类的普遍性命题。他认为,历史学虽然也有普遍性的命题,但它属于一种封闭的类,是对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人的普遍特征的概括,而真正的普遍性命题,属于一种开放的类,是对过去、现实、未来的人的某些普遍性特征的概括,这是历史学所没有的。事实是否如此呢?下面,我们以水的形态变化规律为例来讨论一下所谓普遍性命题及其预言功能究竟是怎么回事。

水在一定的温度、一定的气压等条件下,会由液态转变为气态或固态。这是一个有关水的形态变化规律的陈述,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普遍性的命题。水之所以能够由液态转变为气态或固态,这是由水本身所固有的某种性质决定的。但是,要使水本身固有的这种性质现实地呈现出来,又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没有或不具备这些条件,水的形态的转变就不能实现。如果我们把水本身固有的某种性质称之为“理”,把这些外部条件称之为“势”,那么,普遍性命题也就是对事物的“理”与“势”及其关系的概括了。

水的形态变化,既取决于水的固有之“理”,又取决于一定的“势”,取决于“理”与“势”的配合。在这里,我们把“理”与“势”的同时具备并发生实际的影响称之为“合”。“合”,水由液态向气态或固态的转变就能实现。但是,事物的“理”与“势”既有“合”的一面,又有“分”的一面。所谓“分”,即“理”管不住“势”,“势”也管不住“理”。水的“固有之理”管不住“势”,它不能保证“势”的必然具备,既不能创造“势”,也不能消灭“势”;“势”虽然能使水的形态变化成为现实,但它也管不住“理”,既不能从无到有地创造“理”,也不能从有到无地消灭“理”。这就是“理”与“势”的“分”的一面。

波普尔:《历史有意义吗?》,载《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页。
历史学家对个别、特殊事实的关心,总不能说出于单纯的历史兴趣或发思古之幽情。历史中的个别、特殊对于关心或研究它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贝克尔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一文中,说到历史的记忆如何使得一位普通先生能有效地组织起他的生活。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这都表明,历史中的个别和特殊,对于关心或研究它的人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别和特殊,它一定还隐含着更多的东西。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32—35页。哲学家金岳霖在《知识论》中,也谈到有两种普遍性命题,他用“有时或地域限制的普遍命题”与“普遍命题”两个概念来加以区分。(参见《知识论》,第836—839页)也有学者用“限制的全称陈述”与“未限制的全称陈述”来区分这两种普遍性命题(参见张嘉同、沈小峰主编《规律新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这里所说的“理”、“势”以及下文所说的“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均采用哲学家金岳霖先生的说法。参见《势至原则》(刊于《金岳霖学术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论道》(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那么,彼此都管不住的“理”与“势”如何才能达到“合”,从而使水的形态变化成为现实呢?一般说来,“理”与“势”的“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为的“合”,即通过我们人工的操作控制来实现事物的“理”与“势”的“合”。自然科学中的各种实验,都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是自然的“合”,即事物的“理”与“势”的“合”,无法通过我们人工的操作控制来实现,而只能听凭自然本身来造就。事物的“理”与“势”的“合”,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恒常的“合”,另一种是非恒常的“合”。在前一种情况里,或是人为控制的,或是自然造就的,事物的“理”与“势”恒常地处于“合”的状态,比如,经典物理学中许多以地球引力为“势”的因果律,都属这种情况。在后一种情况里,事物的“理”与“势”并不能恒常地处于“合”的状态。比如,离开了各种仪器设备,水在自然状态下要由液态转变为气态或固态所必需的“势”,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具备的。

如上所述,普遍性命题是对事物的“理”与“势”及其关系的概括,它所肯定的是只要“具备一定条件,某种事情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至于条件如何才能具备,则不是命题本身所“管辖”的。比如,命题肯定只要有水,在标准大气压下,在 $0 \sim 100$ 之间,水呈液体;遮 100 以上水呈气体,在 0 以下水呈固体。至于如何能有水,如何才能保持标准的大气压,如何才能使温度保持在 $0 \sim 100$ 之间,或达到 0 以下和 100 以上,那是命题所管不住的。我们可以通过仪器设备人为地促成“理”与“势”的“合”,或者是在自然状态下,许多事物的“理”与“势”自己能够达到“合”。但是,总有一些事物的“理”与“势”的“合”不是我们可以人为地控制的,总有一些事物的“理”与“势”在自然状态中也并不是始渍处于“合”的状态。这样,普遍性命题在用于预言时,就会产生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能对事物的“理”与“势”的“合”作出精确的预测。

(二),不能对事物的“理”与“势”的“合”作出精确的预测,但能预测其“合”的必然性,达到“理有固然,势有必至”的预测效果。

(三),只是肯定事物的“理”与“势”的关系,用作预测,既无精确性,又无必然性,只能达到“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的效果。

自然科学中的普遍性命题用作预测,大都处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历史学中的普遍性命题用作预测,大都处于第三种情况,部分也可以达到第二种情况。上文列举的恩格斯有关不同阶级的联合不能持久,在战胜了共同的敌人之后必然分裂的论断,就是一个“理有固然,势有必至”的命题。它不仅指出了事物的“固有之理”,也指出了“理”所呈现的必然性,用来预测历史的实际进程,可以达“理有固然,势有必至”的效果。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学中的普遍性命题,有一些可以对事物的“理”与“势”的“合”作出精确的预测,这是历史学所达不到的。我们能肯定不同阶级的联合不能持久(这是固有之理),肯定当战胜了共同的敌人,理之呈现所需的“势”也就具备,结果,联合破坏,彼此动起武来。至于“势”何时才能具备,“理”何时才能呈现,这是无法精确预测的。

在预言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习惯性的看法是强调预言的精确性。能否作出精确的预测,这确实是自然科学(尤其是经典物理学)与历史学的一大差异。但是,如果我们把精确性看作是预言的必要条件,看作是能否预言的划分标准,就会引起一些误解,就会把能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页。

黎澍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一文中,称这个命题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不能精确预测与能不能预测等同起来。

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的序言里,概括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二),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三),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按我的理解,波普尔所说的人类历史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对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的普遍特征的概括,而是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某种普遍特征的概括。也就是说,它应该属于沃尔什所说的开放类的普遍性命题。而且,按我的理解,肯定人类历史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影响,也就肯定了历史过程中存在着某种重演性。只是波普尔强调科学预言的精确性。他认为,我们无法对知识的增长作出合理或科学的预测,不能因此而制订出一套精确的社会日历,所以,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

社会的预测不能精确地制订出一套社会日历,这是事实,这也是历史学不同于(或说逊色于)自然科学的地方。指出这一点,并对历史学中种种类似神学目的论的历史预测理论进行批判,这是波普尔历史哲学的合理的方面。但是,就此是否可以说历史学没有预测功能呢?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或界定“预言”的含义问题。

预言一词,可以有两种理解:(一),能够精确地预测某事必然在某时、某地发生,固然是一种预言;(二),不能精确地预测其发生的时间地点,但能准确地预测其必然发生,也是一种预言。前者固然是真正的普遍性命题,后者也不能说它不是真正的普遍性命题。波普尔强调区分科学的预言与非科学的预言,他认为,科学的预言都是有条件的,而无条件的预言则是非科学的预言。波普尔的这一看法,也是合理的。但是,是不是有条件的预言与能不能精确预言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涉及的是科学预言与非科学预言的划分,是本质上的区别;后者涉及的是科学预言的精确性或强弱程度上的差异。把无精确性与无条件性混同起来,就会得出历史不能预测或历史学没有真正普遍性命题的看法。

在预言问题的研究中,另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是预言的例外问题。

沃尔什说:“关于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那些命题的普遍特性的这一观点,是和另一种观点紧密相联系着的。我们倾向于认为,科学知识乃是某种程度上总会有用的知识,其有用就在于它能够使我们掌握现在或预言未来”。因此,通常也总是以能否作出成功的预言来衡量命题的普遍性。所谓成功的预言,一般的理解就是预言的一无例外或屡试不爽。某一命题的预言如果能够一无例外或屡试不爽,那么我们就称它是真正的普遍性命题;某一命题的预言如果有例外,预言“落空”,那么,我们就不称它是真正的普遍性命题。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自然科学和历史学,我们就会看到,自然科学中的命题的预言常常是一无例外的,而历史学中的预言常常是有例外的。既然有例外,那么历史学中就没有真正的普遍性命题。这恐怕也是沃尔什、波普尔等否认历史学有真正的普遍性命题的一个理由。

预言能够一无例外,当然证明了命题的普遍性,这是不会有疑问的。问题是,预言的“落空”或有例外,是不是就表明了命题没有普遍性呢?这实际上还是学术史上的一个老问题,自休谟以来,讨论因果必然性的学者,都为因果关系的例外问题犯难。金岳霖先生

有关波普尔历史哲学的合理的方面,可以参见启良:《波普尔历史哲学的再认识》(刊于《历史研究》1996.1)。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28页。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因果关系是有必然性的,而因果关系的现实是无必然性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淆。我们不能因为因果关系的现实无必然性而说因果关系无必然性,也不能因为因果关系有必然性而说因果关系的现实有必然性。他举例说,人吃了若干砒霜会在几分钟里死去,这是一个因果关系,不会有例外。但是,某甲在吃了若干砒霜之后,医生马上设法让他吐出来,结果某甲得救;或者是某甲吃了若干砒霜后,几秒之内头部挨了枪弹,结果未等砒霜发挥作用已经死去。那么,我们能不能因为某甲没死(或是死于枪弹)而说“砒霜能致人于死”的命题有例外、没有普遍性呢?会不会说“砒霜能致人于死”的命题没有预言作用呢?当然,我们不会这么说。又如,气象学的研究,对有关降雨、降雪等现象已经概括出一系列普遍性命题,它能够帮助我们成功地进行人工降雨或人工降雪。然而,当我们依据这些概括去进行气象预报时,则常有落空。如果我们因为预言落空而说这些概括不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么又如何解释我们依据这些命题成功进行人工降雨或降雪呢?显然,预言的例外并不足以说明该命题没有普遍性。

为什么预言的例外仍不足以证明该命题没有普遍性呢?从上文的事例可知,例外的事实——某甲吃了砒霜没有死,或天没有下雨——并不是命题所要肯定的事实,例外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条件不具备,“势”不至则“理”就不能呈现。然而,“势”不至“理”就不能呈现与“势”至“理”就必然呈现并不矛盾。“理”与“势”之间的关系的必然性与这种关系实现的必然性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势”有不至,而说事本无“理”;也不能因为“势”之不至,而说“理”有例外。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曾提到历史学家阿克顿的名言,即“一切权力都使人腐化,绝对权力则使人绝对腐化”。但他并不把它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命题,而只是说它不“构成历史学家的主要关怀”而将它打发了。其实,就揭示事物的“理”与“势”之间的必然关系而言,阿克顿的这一名言,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命题。只是用作“预言”,只能达到“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的程度。如果这样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历史学中的普遍性命题在用作“预言”时,它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达到“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的程度,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仍然是一种真正的普遍性命题,仍然可以在帮助我们掌握现在或预言未来中体现出它的有用性。

参见金岳霖:《知识论》,第637~683页。《论道》,第199~203页。

金岳霖先生很早就提出了这个论点,在《论道》一书中,他写道:“休谟讨论因果关系,其所以绕那么一个大圈子者,也因为它碰着势无必至问题。他承认势无必至,就以为理也没有固然”。其实“有理之有不是有势之有,未显的理仍为理”。“某关系现实不足以表示它就是因果关系,某关系不现实不足以表示它不是因果关系或者是例外的因果关系”。(第201~203页)张嘉同、沈小峰主编的《规律新论》也持这种看法,该书写道:“因果的决定性指的应该是条件与结果之间确定不移的对应关系,其中并不包含条件的确定性,这样,由于条件的不确定导致的结果的不可预言性与因果的决定性并不矛盾”。(《规律新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48~149页)。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31~32页。

分析阿克顿的这一名言,我们发现,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中的普遍性命题在陈述上,往往缺乏清晰性,对命题所包含着必要条件缺乏严格的限定。这不仅造成对命题的检验更加困难,也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分歧。本文旨在说明:命题在预言上的例外,并不说明该命题不具有普遍性。有关预言上的例外的另一种解释,是规律的概率性。王和、周舵先生的《试论历史规律》,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该文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除了必然性规律外,还有一种概然性规律,并以中国历史上的“让步政策”为例来加以说明。有关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撰文,作专门的讨论,其中心问题是:概然性究竟是本体论上的概念,还是认识论上的概念。即概然性是历史本身的性质,还是我们为了方便而采取的一种描述。

SUMMARIES OF ARTICLES

On the 'Repeat' of History and the 'Prophecy' of Historical Science

Zhang Genghua

This article looks into two major issues. One is on whether there are 'repeat' and repeatability in history. It discusses such questions as what is 'repeat', in what sense there can be 'repeat' in the natural world and in what sense there can be 'repeat' in history. Another is on whether there are genuine universal propositions in historical science. This refers to such questions as whether there are in historical science universal propositions of the function of 'prophecy' and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versal propositions in historical science compared with natural sciences. On these problems, 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new ideas.

Discussions on Three Issu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y

Zhang Kelan and Wang Xiaoqing

This article makes an inquiry into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y from a new angle and focuses its discussions on three issues: objectified truth, methods of formalization and the spirit of historiography.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Canadian Historical Science

Yang Lingxia

This article makes a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 in Canada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present and analyses its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